

中国当代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影响因素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

胡莹,李树茁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打工地所结识的非同乡男性成婚的外出务工流动女性比例越来越高,成为当前中国伴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并迅速扩大的新型婚姻模式。通过使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流动专卷数据,研究农村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外出务工流动女性通婚圈正在迅速扩大,新型婚姻模式已经占一定比例,且新型婚姻与传统婚姻的模式匹配特征显著不同。新型婚姻模式家庭比传统婚姻模式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村流出女性选择与外乡人成婚模式的比例,具有较好个人条件的农村流动女性更容易选择与外乡人成婚。

[关键词] 流动女性;婚姻模式;中国农村

[中图分类号] C91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13)04-0040-08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通常局限在血缘、亲缘和地缘的狭窄范围之内,因此形成了中国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相互重合、通婚距离小、相对封闭的传统农村婚姻模式。此外,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婚姻为手段来实现居住地改变的婚姻迁移一直以来是中国农村女性进行移民的主要手段。但农村女性婚姻迁移仍然受到其固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制约,成功实现远距离婚姻移民的农村女性比例仍然不高,难以改变中国农村女性的传统婚姻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整体经济飞跃和区域经济结构变迁,人口迁移和流动规模呈现爆炸式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目前中国流动人口已达2.6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9.5%。其中,外出务工经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流动人口中占比最大的原因^[1]。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农村女性传统婚姻模式的冲击和影响也是巨大的。事实上,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女性的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伴随着流动也发生了改变,其

通婚范围正在快速扩大。2011年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显示,全国约有15.7%的城乡流出女性其配偶是“在外结识的非同县异乡人”,远高于10年前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2]。

根据农村流动女性与其配偶户籍注册地的异同分类,其婚姻构成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回原籍与本县市家乡人或在流入地结识的同县人结婚;第二种情况是与在流入地打工所结识的当地人成婚;第三种情况是与在流动过程中所结识的外乡人(非流入地当地人或老乡)结婚。从通婚区域和距离来看,第一种情况与通婚范围较为狭小的农村传统婚姻模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农村流出女性最后仍然是与流出地当地男性完成婚配。而后两种情况则与中国农村女性的传统婚姻模式不同,流出女性与外乡人成婚突破了狭小通婚地域范围和当地熟人婚姻市场。本文将这种在流动过程中与外乡人成婚的婚姻形态称为农村流动女性的新型婚姻模式。这种伴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大规模跨区域新型婚姻模式,其婚姻模式和影响因素与传统婚姻模式不同^[3]。这种新型婚姻模式以其流动、开放和自主为特征,正悄然改变着中国农村通常由

[收稿日期] 2013-03-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H020)

[作者简介] 胡莹(1986-),女,江西南昌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树茁(1963-),男,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熟人圈构成的相对封闭狭小的传统婚姻市场,其引发的社会影响将是明显和深远的。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将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和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在这种宏观政策背景下,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革步伐的加速推进,以及外出务工女性独立性、自主性和城市适应程度不断提高,将进一步为他们的社会融合及与流入地男性通婚奠定更好的基础^[4]。可以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女性选择与在流动过程中结识的外乡人成婚。因此,研究劳动力市场上农村流动女性的这种新型婚姻模式,揭示其婚姻匹配特征、成婚影响因素及其社会融合途径等等,将成为越来越重要和紧迫的社会管理创新课题。对这种新型婚姻模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的婚姻家庭变迁趋势,而且对提高流动女性婚姻家庭治理和稳定社会关系,以及促进中国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大规模未婚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经商对输出地婚姻市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留守在经济相对落后村庄里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成婚机会,受到女性劳动力外迁的影响更大^[5-6]。伴随着劳动力大规模流动而出现的跨区域新型婚姻模式的比例日益增加,对中国传统以地缘为主的相对封闭的农村婚姻市场的影响和冲击也将越来越大,无论是对微观层面婚姻和家庭福祉还是宏观层面当代中国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女性传统婚姻迁移的时空特征、动因(经济动因、地域性因素、个人因素等)、机制、途径和后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7-10]。对传统婚姻迁移女性家庭的婚姻匹配模式进行了较多研究,也从宏观层面做了不少定性的分析。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上流动女性的新型婚姻模式、机制和影响研究还不多。新一代农村流出女性的丈夫和传统农村婚姻迁移妇女丈夫的特征已经有所不同。当前中国流动女性的婚姻特征到底如何,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外,劳动力流动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非常大,因此流动女性的新型婚姻模式、特征及规律也必将随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变化。这是一个值得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的新课题。

限于微观样本获取难度,采用大范围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还十分缺乏,从微观样本层面采用统计模型分析来解释流动女性婚姻匹配影响因素还不多见,对中国近年来农村流动女性婚姻匹配模式的研究就更

为少见。因此迫切需要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流动女性婚姻模式和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并探讨其成婚模式的影响因素。第三次中国妇女地位调查开始专门设置流动人口调查专卷,为近10年中国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特征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和科学的数据支持。本文以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流动卷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统计模型来揭示当前中国农村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特征及成婚影响因素,并讨论促进选择跨区域婚姻模式的流动女性权益保障的相关措施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设计

伴随劳动力大规模流动而出现的与外乡人成婚的农村流出女性跨区域新型婚姻模式,属于人口流动与婚姻理论的研究范畴。对这种新型婚姻模式,用于分析传统婚姻迁移的人口推拉理论和移民网络理论并不能给出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缔结往往是人口流动的结果;而传统婚姻迁移女性的婚姻缔结则与此相反,婚姻是迁移的原因。西方学术界对于人口流动对婚姻家庭的影响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流动对婚姻产生了消极影响,推迟了流动人口的成婚年龄,其弱势地位不利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成婚^[11-13]。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流动扩大了适婚人口的择偶范围和选择机会,提高了不同区域成婚的可能性,有利于加速流动人口婚姻的形成^[14,15]。这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实际上是从流动人口潜在结婚机会和婚姻缔结结果两种不同角度所进行的解读。而流动女性婚姻缔结往往还受到择偶观念、婚姻行为以及社会融合等多个方面的制约,不单纯是结婚机会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农村流动女性的跨区通婚比例在逐渐扩大,同时初婚年龄也在增加。考虑到流出未婚女性外出务工进入新的劳动力市场时,实际上作为新成员同时也进入了流入地婚姻市场。因此我们认为要理解当前中国流动女性的婚姻行为和特征,还必须结合社会学的人口婚姻家庭理论来进行探讨。

婚姻交换理论和婚姻市场理论是目前西方学术界进行择偶和婚姻研究的主要社会学理论^[16-20]。其中婚姻交换理论是社会交换理论观点在择偶和婚姻领域的应用,也是择偶和婚姻缔结研究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该理论将婚姻缔结视为一种等价交换,强调个人自身特征和资源同自身择偶偏好之间的匹配关系,认为择偶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16]。婚姻市场理论和婚姻交换理论均认为影响婚姻行为影响因素包括

个人层次(如个人经济状况和个人非经济状况)和婚姻市场层次的因素。在婚姻市场供需不平衡的背景下,个人特征状况往往决定其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特别是经济特征对增加结婚机会具有积极作用^[21]。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常常表现出较差的经济资源和个人特征,如较差的经济状况、偏低的受教育水平、偏大的年龄、内向和不善言谈的性格等^[21-23]。而关于流动人口的婚姻行为和匹配模式,西方学术界已经提出了人口结构理论^[24]、结构同化理论^[25]、社会地位分析理论、交换理论、选择理论等众多社会学理论^[26]。其中交换理论认为在异地新环境下工作产生的压力强化了外来流动人口的婚姻交换意识,促成了婚姻市场上社会经济优点和非社会经济优点相交换而形成的婚配^[27]。基于婚姻交换理论,国外对婚姻移民家庭婚姻匹配模式与特征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强调“平等身份交换假设”^[14],并重点关注夫妻的经济匹配方式(如教育、职业和收入等)和年龄匹配特征^[28-29],认为女性倾向于选择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而男性则倾向于选择社会经济地位中等或低于自己的女性^[30]。

西方学术界对个人非经济特征的研究比较少。在有限的研究中大多关注年龄因素,而其它个人特征较少引起关注。家庭因素的影响也较少被提及,只有少数研究强调父母受教育水平和父母离异对子女婚姻行为的影响^[31]。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国内学者比较重视个人非经济特征对婚姻机会的影响,也比较强调家庭因素在择偶和婚姻的缔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32]。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习惯中,婚姻不仅是当事人双方个体的事情,更是涉及双方两个家庭的大事,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村家庭更是如此^[21]。因此夫妻双方家庭情况包括父母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条件均会影响子女婚姻缔结。这在中国农村女性婚姻迁移中已经得到实证,作为一种“资源交换”,迁移女性的丈夫往往是那些年龄大、经济状况差、或者存在身体或心理的缺陷,在当地婚姻市场结婚机会受限的男性^[3-5,21]。考虑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以人口流动婚姻交换理论为指导,本文认为流动女性的个人层次变量(包括本人和配偶变量)和家庭层次变量均会对其婚姻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具体见图1的研究框架图。对于农村流动女性来说,流动扩大了其所面临的可供资源交换的婚姻市场,通过流动从当地狭小封闭熟人圈婚姻市场扩展到了流入地婚姻市场。流动女性在选择具体婚配模式时,其家庭特征对基于资源交换的婚配决策过程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最终流动女性在其择偶偏好和婚配决策下完成其婚姻模式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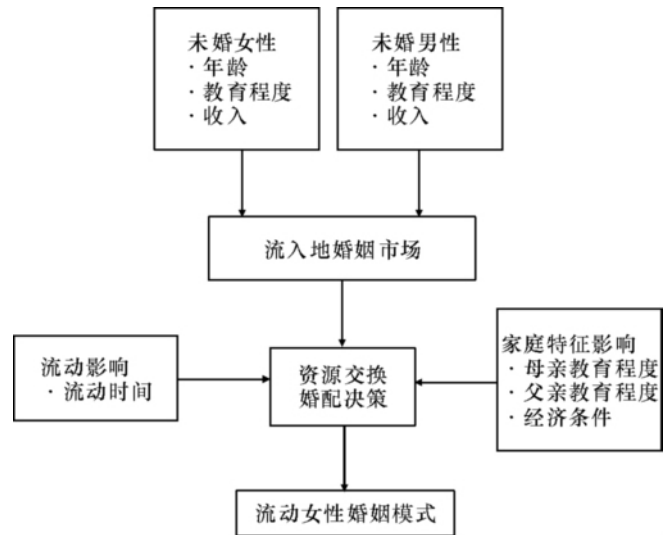


图1 流动女性婚姻模式的分析框架

二、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全国妇联联合国家统计局以2010年12月1日为基准时点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1990和2000年分别进行了第一期和第二期抽样调查)。针对当前中国存在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现实,设置了流动专卷对流动女性个人/家庭层面多个方面的调查变量。流动专卷调查中流动女性定义为外出务工经商半年以上且目前仍在外地的流动女性。为了对农村流动女性婚姻模式和匹配特征进行研究,本文将流动卷调查中选择“配偶为流动时在外结识的当地人或非老乡外地人”的已婚农村流动女性样本,定义为新型婚姻模式样本;在流动卷调查中选择“配偶是同县老乡”的农村已婚流出女性样本,定义为传统婚姻模式样本。据第三次妇女调查数据定义,老乡特指户籍为同县市的人群。

从第三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流动卷中识别出农村流出女性样本1007个^①。其中,配偶是在外出务工经商认识的非老乡的新型婚姻模式样本数为121;配偶是同县市老乡传统婚姻模式样本数437人。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农村流动女性占全部已婚农村流动女性人数的比例为21.7%。考虑新生代未婚农民工逐渐进入婚姻市场,选择与非老乡婚配的新型婚姻模式的流动人口数量和比例将会越来越大。例如湖南省有19.5%的湖南流出女性配偶是“在外结识的异乡

① 从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库统计。

人”^①;四川省和重庆市这一数据分别为18.5%和11.4%^②。对于农村流出未婚女性群体来说,显然不断提高的与非老乡(工作地当地人或外乡人)成婚比例意味着农村流动女性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流出女性在打工地能成婚通常也被认为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和社会支持网络质量的一个较好衡量指标之一^[4]。这一指标的攀升反映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和生存环境正在逐步提高和改善。

(二) 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当前中国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匹配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农村流动女性成婚模式的影响因素。本文因变量选择为已婚农村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将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分为与同乡成婚的传统模式和与外乡人成婚的新型模式两种主要类型,因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对流出女性婚姻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对于解释变量的选择,婚姻交换理论假设婚姻市场供需平衡,认为个人的择偶偏好和婚姻行为仅受到个人层次因素的影响^[17]。因此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常常作为社会经济状况的测量指标,其中教育程度被认为能可靠地反映个人社会经济状况和经济潜能,而职业则是个人收入的直接反映^[21]。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流动卷样本主要来自农村的流出女性构成,全体样本户籍类型基本上是农业户口。从职业类型来看,样本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餐饮酒店业和便民服务行业。方差分析表明两组样本的户籍类型和职业等个体变量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和明显的相关性。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所能获得的变量,流动女性个人特征变量主要选择年龄、教育、初婚年龄以及年收入等。这些变量基本可以测度流出女性个体在婚姻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力和婚姻匹配特征。

除了个人特征变量,婚姻市场理论(包括性别失衡理论、可婚配男性假设和婚姻寻找理论等)侧重考虑婚姻市场不均衡下的择偶和婚姻缔结,更重视当地婚姻市场因素的影响^[19]。对于农村流动女性来说,流动带来了新的婚姻市场和成婚机会,因此采用婚前外出流动总时间长短来衡量婚姻市场上机会的多寡,以作为婚姻市场流动特征的测度。一般来说研究人口流动时,流入地域(例如东部、中部和西部)也是个重要变量。但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女性主要流向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调查抽样样本中西部新型婚姻模式样本

比例很小,不足以给出具有统计意义的结果,故不再对样本进行地域分组。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女婚姻决策往往也会适当考虑双方家庭情况,因此家庭层面的变量还涉及父母和配偶个人特征情况。根据图1的分析框架和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流动样本所能够得到的变量,本文最终所选择的变量及其定义如表1所示。其中各变量的类型及分类标准沿用第三次妇女调查问卷的定义。

表1 流动女性个体/家庭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说明
因变量	
流出女性婚姻模式	1 新型:与外地人结婚;0 传统:与老乡结婚
自变量	
女性个体特征	
教育程度	0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3 大专及以上学历
年收入	调查时点前一年年总收入(元)
初婚年龄	女性初婚年龄(岁)
外出总时间	结婚前的流动总时间(年)
配偶个体特征	
配偶收入	配偶前一年总收入(元)
配偶教育程度	0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3 大专及以上学历
配偶初婚年龄	配偶初婚年龄(岁)
家庭特征	
经济条件	1 男方家好;2 女方家好;3 两家差不多
父亲教育程度	0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3 大专及以上学历
母亲教育程度	0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3 大专及以上学历

三、结果与讨论

(一) 流动女性婚姻模式与特征

为了从总体上揭示中国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和匹配特征,表2给出了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问卷所能获取的重要婚姻特征参数的描述性统计。首先对不同组别家庭夫妻双方教育程度进行分析。从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比例分布情况来看,传统婚姻模式组流动女性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人数占到了近78%,而新型婚姻模式组女性约50%。特别是新型模式组女性样本的小学程度以下比例是传统组流动女性的五分之一;而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又是传统模式组女性的3倍以上。这种教育程度分布差异使得新型婚姻模式组女性平均教育程度均值远大于传统组女性。同时

① 湖南省政府新闻办(2012):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湖南地区调查结果。

② 四川省和重庆市妇联(2012):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省级调查结果。

新型模式组女性丈夫受大专以上学历程度比例 4 倍于传统模式组女性。从两个组别的教育程度分布来看,新型模式组流出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幅度要大于其配偶教育程度的提高幅度,因此其夫妻双方教育程度不仅高于传统模式组,且双方教育程度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这说明农村流出女性的新型婚姻模式属于同质婚姻,即夫妻双方倾向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属性^[33]。

表 2 农村流动女性不同婚姻模式比例及匹配特征

属性	新型婚姻模式组	传统婚姻模式组
样本数	121	437
比例	21.68%	78.32%
女性个体特征		
教育程度(比例)		
小学及以下	6.67%	32.09%
初中	43.47%	45.96%
高中	38.52%	18.43%
大专以上	11.11%	3.52%
初婚年龄均值(岁)	23.65	22.42
流动时间均值(年)	5.60	4.81
年收入均值(元)	22457	19718
配偶个体特征		
初婚年龄均值(岁)	26.09	24.1
配偶年收入(元)	28059	22023
配偶教育程度(比例)		
小学及以下	3.85%	14.05%
初中	38.46%	56.18%
高中	38.46%	24.53%
大专以上	19.23%	5.24%
家庭特征		
夫妻年龄差均值(岁)	2.45	1.69
夫妻教育程度差均值	0.19	0.28
夫妻收入差均值(元)	4313	2581
母亲教育程度(比例)		
小学及以下	65.67%	84.65%
初中	29.10%	11.51%
高中	5.22%	2.99%
大专以上	0.00%	0.85%
父亲教育程度(比例)		
小学及以下	46.27%	65.66%
初中	41.04%	25.05%
高中	11.19%	7.99%
大专以上	1.49%	1.30%

资料来源: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年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流动卷数据

从经济条件匹配来看,新型组女性及其配偶的年收入均显著高于传统组。与外乡人组成家庭的流动女

性,其个人经济条件要高于与老乡组成家庭的流动女性。新型模式组流动女性平均收入仅比传统模式组女性提高约 10%,但其配偶的平均收入却比传统组配偶的收入提高近 30%。这可能与新型模式组女性教育程度较高更容易选择同质婚姻也有一定的关系,也体现了一定的资源交换特征。从夫妻年龄匹配特征来看,新型模式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比传统模式组女性大了 1 岁多;其配偶的年龄也比传统模式组的大了近 2 岁。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获得相对较高收入,都需要花费更多额外时间投入,因此新型婚姻模式组家庭夫妻双方初婚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平均收入均高于传统模式组也符合常理。这也证实了人口流动与婚姻理论关于流动可能推迟初婚年龄的观点,也间接验证第三次全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数据质量能够验证已有的理论观点。

从流动女性父母情况来看,新型模式组女性父母教育程度也显著高于传统模式组。传统模式组母亲为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比例高达 84.65%,远高于新型模式组;初中教育程度也是新型模式组的三分之一。这可解释为父母教育程度较高,通常具有更开放的观念,更容易接受女儿与外地人成婚。就婚前双方家庭经济条件来看,女方比男方好的这一比例新型组(26.32%)约为传统组(15.89%)的 1.7 倍。个人/家庭特征的对比说明,这两种类型婚姻匹配特征的确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已经成为当前农村流动女性的两种明显不同的婚姻模式。其中条件相对较好的流动女性更容易选择与非老乡结婚的新型婚姻模式,在流动过程中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这也可能是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将流动女性通婚范围的扩大和新型婚姻模式比例的提高作为反映妇女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正向指标的原因之一。

(二) 流动女性婚姻模式的影响因素

为了揭示农村流动女性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影响因素,本文构造了如表 3 所示的 3 个 Logistic 回归模型。需要指出的是建模时连续解释变量在回归前先进行归一化。不同的回归模型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反映各解释变量在不同组合下对流出女性婚姻模式的影响程度。其中模型 1 为仅考虑女性个人特征的模型。该模型可用来分析流动女性个人特征变量对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影响。由于婚姻缔结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还需要考察配偶的个人情况,因此模型 2 为加入配偶特征后的回归模型,这样可以反映资源交换效应对婚姻模式选择的影响。模型 3 为加入父母家庭特征后包括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这样回归模型能比较全面考虑流出女性个人、配偶和家庭三个方面对婚姻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表1 流动女性个体/家庭变量定义

变量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女性个体特征			
教育程度(对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1.28 ^{***} (0.40)	1.22 ^{***} (0.41)	1.08 ^{***} (0.40)
高中	1.91 ^{***} (0.41)	1.90 ^{***} (0.42)	1.54 ^{***} (0.43)
大专及以上学历	2.15 ^{***} (0.53)	2.15 ^{***} (0.54)	1.72 ^{***} (0.58)
年收入	0.32 (1.36)	0.53 (1.28)	1.47 (1.45)
初婚年龄	-3.13 ^{***} (0.93)	-3.89 ^{***} (1.10)	-3.76 ^{***} (1.22)
配偶个体特征			
配偶初婚年龄		6.14 (1.49)	5.38 ^{**} (1.65)
配偶年收入		1.11 (1.29)	1.57 (1.61)
配偶教育程度(对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40 (0.54)	0.44 (0.55)
高中		0.78 (0.56)	0.68 (0.57)
大专及以上学历		0.89 (0.68)	0.82 (0.69)
教育差		-0.31 [*] (0.35)	-0.47 (0.2731)
家庭特征			
婚前家庭经济情况(对照组: 双方差不多)			
男方家好			0.32 (0.31)
女方家好			0.86 ^{***} (0.29)
母亲教育程度(对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71 ^{**} (0.32)
高中			-0.21 (0.62)
大专及以上学历			-
父亲教育程度(对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32 (0.12)
高中			0.27 (0.13)
大专及以上学历			-
流动特征			
外出时间	1.14 ^{**} (0.62)	1.27 ^{**} (0.66)	1.38 ^{**} (0.70)
常数项	-0.74 [*] (0.65)	-0.72 [*] (0.68)	-5.75 ^{***} (1.38)
Percent Concordant	72.3	72.4	78.7

注: 系数小于 0 代表负影响, 大于 0 代表正影响;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资料来源同表 2。

模型 1 表明流出女性教育程度与选择新型婚姻模式显著统计正相关, 而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 教育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变大。这说明农村流出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 选择与外地人成婚的概率就越高。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是农村女大学生更容易在城市选择和外乡人成婚。流动女性初婚年龄自变量系数为负说明流出女性年龄越大, 与外地人成婚的概率就越小。一方面因为年轻女性在婚姻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另一方面新一代年轻流出女性要比年长的流出女性在婚姻观念上更易接受与外地人的成婚。流动女性的流出时间也与选择新型婚姻模式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尽管从统计平均值来看流动推迟了流动女性的初婚年龄至少 1 岁以上, 但流动也扩大了流动女性的通婚选择范围。农村流动女性外出时间越长, 更加能适应流入地(通常是城市)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观念, 面临更多接触非老乡男性的机会, 也具有更加开放的婚恋观, 更容易在流动过程中选择与外乡人成婚。

模型 2 为加入配偶个体特征的情况。从该模型中可以看到流动女性配偶的教育程度解释变量与因变量并不统计显著, 但夫妻双方教育程度差与因变量负相关。这说明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农村流出女性倾向于与自身教育程度相对较小的外地男性成婚, 关注的是与配偶的相对个人特征而不是绝对值。配偶的收入也并没有体现出统计显著性, 这表明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流出女性样本在婚姻上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 由于此类流动女性自身收入和教育条件并不差, 配偶收入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性。在控制住配偶个人特征变量后, 可以发现流出女性的年龄和教育程度与因变量依然呈现出较强的统计显著性。不过配偶效应导致流出女性年龄解释变量的负系数变小, 教育程度各虚拟变量的系数也有稍微下降。这反映出在婚姻选择时男性对女性年龄有偏小的偏好, 同时对女性教育程度并不是过分关注。

模型 3 为加入家庭特征的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 由于变量的增加使得模型 3 的解释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加入家庭变量后, 流动女性配偶的初婚年龄、母亲教育程度和女性家庭条件开始变得显著。模型 3 反映母亲教育程度对女儿婚姻模型的影响比较复杂。相对于小学程度, 母亲教育程度提高为初中程度与外出女儿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婚概率呈现正相关。但相对于小学程度, 母亲教育程度为高中的流动女性与外地人的成婚概率并不显著。这可能是母亲为高中教育程度的家庭条件通常比教育程度低的家庭要好, 能够为女儿在家乡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或支持。由于大学教育程度母亲样本数很少, 故回归系数可信度不高, 在

模型中不予采用。而父亲的教育程度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性。这可以解释为在农村母亲对女儿婚姻模式选择可能比父亲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流动女性相对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与选择新型婚姻模式正相关,这可以解释为父母良好的经济条件有助于提高农村流动女性在流入地婚姻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模型3反映当前中国农村家庭情况对外出子女的婚姻行为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

上述回归模型表明,第三次妇女调查农村流动女性样本的流动时间、教育程度、初婚年龄、母亲教育程度等特征与其选择与外地人成婚的新型婚姻模式统计显著。从个人显著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来看,流动女性自身个人特征对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影响最大。

四、结论

本文以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全国流动卷中流动已婚女性为样本,研究了当代中国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匹配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商农村流出女性与外地人成婚的新型婚姻模式和与老乡成婚的传统婚姻模式有显著的区别。新型婚姻模式中农村流出女性及其配偶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均显著高于传统婚姻模式家庭。新型婚姻模式流出女性及配偶的平均初婚年龄也明显大于传统婚姻模式家庭。可见新型婚姻模式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同质婚姻属性,其初婚年龄和夫妻年龄差距均大于与老乡成婚的传统婚姻模式家庭。这些显著不同的婚姻匹配特征表明当前中国农村外出务工流出女性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婚姻模式,且选择与外地人成婚的新型婚姻模式的农村流出女性比例有上升的趋势。

Logistic 回归模型所揭示的农村流出女性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这些。(1) 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流出女性选择迁移成婚模式的比例;可见教育程度不仅能提升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而且是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获得较好竞争力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2) 女性流动时间越长,选择与外地人成婚的比例随之增加;其初婚年龄也随之增加。(3) 女性家庭开明程度,特别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对流出女性选择新型婚姻模式有显著影响。(4) 流出女性父母相对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与其选择新型成婚模式概率正相关。而农村流动女性的个人收入并没有表现出与选择与外地人成婚模式概率的显著相关性。这说明单纯通过提高收入并不一定能提高农村流出女性在流入地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存在婚姻挤压的婚姻市场环境下,高收入和较高教育程度的未婚女性由于择偶条件的提高,反而可能面临有效婚姻选择空间缩小的情况。

研究还发现由于选择新型婚姻模式的流动女性比例要高于流动男性比例,这会导致在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农村年轻女性随着劳动力迁移而大量流出农村地区将对经济相对落后且原本性别严重失衡的农村地区产生更加严重的婚姻挤压后果。因此劳动力输出规模较大的农村地区应及早建立应对城镇化可能会导致的局部婚姻挤压的公共对策。另一方面,在国家大力推动建设全面小康生活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宏观政策背景下,各主管部门应尽可能为新生代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年轻流动女性,以及与农村流动男性一起返乡的外地媳妇在就业、创业和社会融合等各方面提供男女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网络支持。

[参 考 文 献]

- [1] 国家统计局(2012).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 宋秀岩.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等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EB/OL]. [2011-10-21] http://www.china.com.cn/zhibo/2011-10/21/content_23658179.htm
- [3] C. Cindy Fan. China on the move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M]. Taloy & Francis Group, New York, 2008.
- [4] 靳小怡, 任锋, 任义科, 悦中山. 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初婚性别视角的研究[J]. 人口学刊, 2009(4): 23-33.
- [5] 姜全保, 李树茁. 女性缺失与社会安全[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6] Lei Meng. Bride Drain: Rising female migration and declining marriage rates in rural China. Working Paper, Xiamen University, 2009.
- [7] 刘芝艳. 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跨省婚姻研究——以皖黔鄂三村为例[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 [8] 艾大宾, 李宏芸, 谢贤健. 农村居民婚姻迁移空间演变及内在机制: 以四川盆地为例[J]. 地理研究, 2010(8): 1428-1438.
- [9] 李树茁, 胡莹. 性别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 评述与展望. 人口与经济, 2012(2): 1-9.
- [10] 李树茁等. 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研究[R].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委托课题研究报告, 2013.
- [11] Parrado, E. A. Marriag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iming and ordering of 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mong men in western Mexico [R]. IUSSP/CENEP Buenos Aires, May 13-15, 1998.
- [12] Chattopadhyay A. Marriage and migration in the changing socioeconomic context of nang rong, Thailand [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March 25-27, 1999.
- [13] Charles Ochola Omondi. Migration consequences on marital behaviour in Kenya [J]. Journal of Geography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2(2): 61-67.

- [14] Aree Jampaklay. How does leaving home affect marital timing? An event – history analysis of migration and marriage in Nang Rong ,Thailand [J]. *Demography* 2006(4) : 711 – 725.
- [15] Kenjiro Yagura. Does labour migration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meeting prospective spouses? The case of migrant workers in Cambodia [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2 (3) : 277 – 294.
- [16] Rosenfeld MJ. A critique of exchange theory in mate selection [J]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5 (5) : 1284 – 1325.
- [17] McLaughlin DK ,Lichter DT. Poverty and the marital behavior of young women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7 (3) : 582 – 594.
- [18] Lloyd K. Latinas transition to first marriage: an examination of fou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6(4) : 993 – 1014.
- [19] Grossbard S ,Amuedo – Dorantes C. Marriage markets and married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 *Working Papers* 2005.
- [20] Guzzo KB. How do marriage market conditions affect entrance into cohabitation vs. marriage?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6 (2) : 332 – 355. |
- [21] 刘利鸽. 婚姻挤压下中国农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 and 策略研究 [D].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2012.
- [22] 叶妍 叶文振. 流动人口的择偶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 [J]. *人口学刊* 2005(3) : 46 – 52.
- [23] 陆淑珍. 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外来人口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三角某地区为例 [J]. *南方人口* 2010 (6) 60 – 64.
- [24] Cುತ್ತentag M. and Secord P. Too many women: sex ration question [M].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3.
- [25] Stephen E. H. and F. D ,Bean. Assimilation ,disruption and the fertility of Mexican – origin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2(1) : 67 – 88.
- [26] 孙琼如 叶文振. 国内外流动人婚姻家庭研究综述 [J]. *人口与发展* 2010(6) ,104 – 108.
- [27] Strong ,B. and C. DeVauh.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experience [M].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 [28] Jeroen J. A. Spijker ,Albert Esteve. Changing household patterns of young couples in low – and middle – income countries [J].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2011(4) : 437 – 455.
- [29] Theo Engelen ,Paul Puschmann. How unique is the Western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A comparison of nuptiality in historical Europe and the contemporary Arab world [J].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2011(4) : 387 – 400.
- [30] Greitemeyer T. What do men and women want in a partner? Are educated partners always more desirable?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7(2) : 180 – 194.
- [31] Avery R ,Goldscheider F ,Speare A. Feathered nest/gilded cage: Parental income and leaving home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J]. *Demography* ,1992: 375 – 388.
- [32] Lei Chang ,Yan Wanb ,Todd K. Shackelford ,David M. Buss. Chinese mate preferences: Cultural evolution and continuity across a quarter of a Century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0(50) : 678 – 683.
- [33] Fu X. Interracial marriage and family socio – economic well – being: equal status exchange or caste status exchange? [J].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08 (1) : 132 – 155.

(责任编辑: 司国安)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f Marriage Pattern of Rural Women Migrants in Modern China ——a study based on the third round of survey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

HU Ying ,LI Shu-zhu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 Xi’an 710049 ,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farmer migrants to marry non – native men farmer migrants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This pattern of marriage has become a new one produced together with the migration of labor forces and extended rapidly in modern China.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latest third round of survey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 carried out jointly by the All – 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nd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in December 2010 , this paper examines trends , characteristics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marriage pattern of rural women migra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rriage circle for women farmer migrants has been expanding rapidly , and the new marriage pattern has taken up a certain proportion. Moreover , the mat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pattern marriage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The couples in the family of the new pattern of marriage have higher degree of education and better social – economic conditions than those in the family of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patter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propels th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pattern that the rural woman migrants choose to marry non – natives. It is easier for rural women migrants with better personal conditions to marry non – natives.

Key words female migrants; marriage pattern; China’s rural areas